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困境与治理路径研究

梅 婷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6日

摘 要

新型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我国随迁老人群体规模持续增长, 却因多重因素陷入心理、家庭、社区、制度层面的社会融入困境, 长期处于“半融入”状态, 既影响其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 也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界定随迁老人与社会融入核心概念, 系统分析其融入困境及制度、社区、文化、个体层面的成因, 从完善制度设计、强化社区服务、激活家庭社会支持、激发个体内生动力四方面, 提出协同治理路径, 为提升随迁老人融入度、完善老年福利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

随迁老人, 社会融入, 融入困境, 协同治理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Dilemmas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Migrant Elderly Following Their Children

Ting Me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School of Social Work,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5, 2026; accepted: June 18, 2026; published: June 26,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group of migrant elderly following their children has been expanding continuously. However,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they are trapped in social integration dilemmas at the psychological, familial, community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remaining in a state of “semi-integration” for a long time. This not only impairs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

z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re concepts of migrant elderly following their childre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ir integration dilemmas and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from institutional, community, cultural and individual dimensions. Furthermore, it puts forwar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s from four aspect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design,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services, activating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and stimulating individual endogenous motivat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enhanc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elderly and improving the elderly welfare system.

Keywords

Migrant Elderly Following Their Children, Social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Dilemm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人口流动呈现出家庭化、代际化的新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显示，2025 年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达 32,338 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的 23%。为帮助子女照料家庭、抚育孙辈或寻求更好的养老医疗条件，大量老年人离开原户籍地，随子女迁居至大中型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随迁老人群体，亦称“老漂族”。

然而，受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壁垒及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影响，随迁老人在迁入地往往面临心理、家庭、社区、制度等多方面的融入困境。他们虽身处城市，却难以真正扎根，常处于“身在城市，根在故乡”的“半融入”“不融入”状态，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与隐形人。这不仅影响随迁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也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深入探究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现实困境、深层成因并探寻有效的治理路径，对于完善老年福利体系、推进健康老龄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随着随迁老人群体的不断扩大，学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也不断增加。当前学界对随迁老人这一概念的解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户籍所在地来看，将其定义为跟随子女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生活的拥有农村户籍的老年人[2]；另一种是从居住地的角度，将随迁老人定义为跟随子女迁移到异乡生活的老年人[3]。尽管定义有所区别，但从社会融入这一角度展开，学者们普遍较为关注随迁老人的群体特征、社会融入状况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其生活质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4]。丁百仁和王毅杰[5]通过研究发现，乡-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处于较为明显的劣势地位，其原因与流动老人这一身份特征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随迁老人作为流动老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择离开家乡跟随子女迁移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一种是身份责任压力，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与代际文化的影响下，老年群体通常会主动承担隔代抚育责任，以此分担成年子女的生活与工作压力[6]，梁丽霞和黄燕亦以女性随迁老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在年龄歧视与性别规范的双重约束下，所面临的身份责任困境与角色冲突问题[7]；另一种是养老需求，受传

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部分老年人为获得更为充分的家庭照料与情感支持[8]，会选择随子女进行迁移流动，同时，城镇地区更为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与宜居的生活环境，也会构成老年人口随迁迁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随迁老人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常常面临着诸多困境。家庭的融入是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重要环节，从微观家庭层面看，翟振武和冯阳[9]指出随迁老人在家庭融入层面面临着观念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等诸多矛盾，进一步制约了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从宏观社会层面看，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在客观因素方面，杨成凤等[10]指出，老漂族由于受户籍、年龄、居住时间、福利待遇等限制，难以真正地融入社会；主观层面，不适应新环境、归属感弱以及情感需求难以被满足等情况也会制约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11]。为此，需要从文化认同[12]、外延保障[13]、数字教育[14]等多方面着手，提高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度。

当前学界围绕随迁老人的研究已覆盖概念界定、迁移动因、社会融入及生活满意度等核心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优化方向，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基于此，本文以现有研究为依托，围绕随迁老人的概念界定、社会融入困境与成因展开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内涵，为提升随迁老人生活质量与社会融入度提供有力支撑。

3. 核心概念界定

3.1. 随迁老人

目前学界对随迁老人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标准，但核心共识在于“跟随亲属迁移”这一核心特征。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老年人通常被定义为60周岁及以上的公民。人口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者长期性的改变，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因此，本文倾向于将随迁老人定义为为了照顾子女或者追求更好的养老医疗条件而永久性或者长期性地离开故乡，迁移到城市生活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其核心特征是非户籍迁移性、家庭依附性与流动被动性。

3.2.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是流动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与互动[15]，不同学科对其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但核心共识在于描述个体或群体融入迁入地社会系统、实现与当地社会和谐共生的过程与状态。结合随迁老人的群体特性，本文将社会融入定义为随迁老人在迁入城市后，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与社会支持系统，在心理层面形成对迁入地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并能够平等获取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源，最终参与城市生活的动态过程。

4.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困境

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是个体与迁入地社会系统逐步融合的动态过程，受到身份属性、场域环境、制度设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在融入过程中也会遭遇心理认同、家庭关系、社区参与及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困境，导致随迁老人难以真正嵌入迁入地的社会生活体系，长期处于“半融入”的边缘状态。

4.1. 心理认同困境

心理层面的融入是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最深层次、也最难突破的一个维度。一方面，随迁老人在原户籍地生活时间较长，与故土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感联结与稳定的熟人社会网络，这也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稳定根基，但其离开原户籍地后，长期建立的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社交网络受到冲击，而在迁入地的新社交网络构建则面临各种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这类群体的迁移决策多出于照顾孙辈等工具性目的，

其普遍持有临时性居住的心理预期，将自己定义为暂时帮忙的人而非城市的新成员，同时，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言隔阂限制了其信息获取与社交能力，以及城乡生活方式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以及不适应，使得许多随迁老人陷入“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他乡”的精神困境，在持续的漂泊感和无根感中陷入心理认同困境。

4.2. 家庭关系困境

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家庭后，原有的代际权力格局往往会发生转变。这类群体在农村环境下积累的生活经验和资本在城市空间内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贬值，部分老人从过去的家庭决策参与者甚至主导者转变为辅助性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其自我价值感。同时，随迁老人多因隔代抚育、照料子女家庭的责任选择迁居，这容易使他们在家庭关系中被视为单一的照料者的角色，由于日常生活轨迹多围绕子女与孙辈展开[16]，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的生活空间与参与外部社会生活的条件。此外，代际之间因成长环境、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教育理念的差异，较易引发观念冲突与生活矛盾，而子女往往因工作繁忙，使得家庭本应具备的情感支撑与融入引导功能有所弱化，这种矛盾冲突可能会成为随迁老人的心理压力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向外的社会融入行为。

4.3. 社区参与困境

社区作为随迁老人日常活动的主要空间，为其提供了开展社会交往、融入城市生活的平台，但多数随迁老人在社区层面往往面临参与意愿与参与机会不足的问题。农村熟人社会所依托的高密度、强联结社交网络，在城市社区相对低度交往的文化环境中难以直接复制，而重建社交网络所需的时间、机会和社交能力，恰恰是部分随迁老人所相对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主动融入社区的主观意愿整体偏低。同时，参与机会的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和使用规则在客观上可能形成一定的参与门槛，某些由本地老年居民自发组织的活动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圈子，随迁老人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融入；而社区公共服务体系长期以来以户籍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对随迁老人的特殊需求关注也相对有限。此外，部分本地居民可能对外来人口持有某些刻板印象或隐性偏见，使随迁老人在日常交往中感受到一定程度的被边缘化。

4.4. 制度保障困境

以户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配置方式，与随迁老人跨区域流动的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性排斥，使其在医疗、福利、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受到制约。在医疗保障方面，尽管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已逐步推进，但报销范围、报销比例与户籍地的差异以及备案流程的复杂性、定点医疗机构的限制等因素，使得随迁老人在实际就医过程中仍面临一定的不便。在社会福利领域，免费乘车、公园优惠、高龄津贴等老年优待政策大多与本地户籍挂钩，随迁老人即使长期居住也难以完全平等享有，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外人”身份感知。在养老服务方面，部分随迁老人既因地理迁移而难以便捷获取户籍地的服务，又因户籍限制而未能充分纳入居住地的服务体系，处于制度覆盖的相对薄弱地带。同时，涉及随迁老人的相关政策分散于民政、卫健、人社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够完善，政策供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特征，也在客观上增加了随迁老人获取公共服务的难度。

5.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困境的成因剖析

随迁老人所面临的多重融入困境，其背后往往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从宏观的制度安排、中观的社区治理、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到随迁老人自身的个体条件，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塑造了当前的社会融入困局。

5.1.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

制度层面的障碍是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困境的重要因素，其核心在于以户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配置方式与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制度性张力。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将人口划分为“本地”与“外来”两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公共资源的规划与分配。这种制度安排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虽已松动，但城市公共服务的预算编制、设施配置、人员配备等，往往以户籍人口为基数进行测算，随迁老人作为“人户分离”群体，在制度设计之初便较少被纳入服务视野。与此同时，涉及随迁老人的相关政策较为分散，各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尚不够清晰，政策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政策供给的碎片化。此外，跨区域社会保障衔接机制仍存在一定短板，省际、市际之间的信息壁垒和标准差异，使得随迁老人在医疗报销、养老待遇等方面面临不同程度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层面的结构性因素，构成了随迁老人融入困境的宏观背景。

5.2. 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滞后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在应对随迁老人这一新兴群体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滞后。一方面，社区治理长期以来以户籍人口为服务重心，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考核、资源配置、服务设计都以户籍人口为基准，对随迁老人的需求识别和服务响应相对不足。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对随迁老人的政策咨询、心理疏导等需求缺乏足够的敏感性，甚至在服务意识上仍存在将流动人口视为“临时人员”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随迁老人服务对专业能力有一定要求，涉及老年社会工作、跨文化沟通、心理疏导等多个领域，而当前多数社区缺乏专职的社会工作者，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储备和能力结构较难完全满足这一群体复杂多元的服务需求。即使部分社区引入了专业社工机构，也往往面临人员流动性大、服务经费有限、服务覆盖面较窄等问题，使得随迁老人在心理调适、家庭关系调解、社区融入等方面的深层需求难以得到充分回应。

5.3. 城市社会的文化区隔

城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本地 - 外来”二元区隔文化，在制度之外构成了另一道隐性的融入壁垒。本地居民往往将城市视为“自己的地盘”，对外来人口可能持有某种程度的戒备心理或刻板印象。随迁老人作为外来人口中年龄较长、行为方式与本地差异较为明显的群体，往往更容易成为这种隐性排斥的承受者。与此同时，城市生活形成了一套关于“文明”“秩序”“卫生”的行为规范，这套规范以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模板，在公共话语中被视为“标准”“正常”。与之不同的生活习惯，无论是来自农村的、底层的还是老年的，则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标记为“落后”或“需要改造”。这种文化上的标准化倾向，使随迁老人的原有生活方式面临质疑，在心理层面容易诱发自我怀疑和低自尊，导致在社会层面表现出社交退缩和自我隔离。

5.4. 个体资本与适应能力不足

从人力资本来看，随迁老人群体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相当一部分人仅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在信息化、智能化的城市环境中，智能手机操作、网上挂号、移动支付等日常技能，对许多随迁老人而言构成了一定的技术门槛；从社会资本来看，随迁老人原有的地缘、亲缘关系网络因地理迁移而被切断，而在城市中重建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机会和社交能力，恰恰是这一群体相对欠缺的；从文化资本来看，随迁老人在长期乡土生活中形成了与农村社会相适应的文化秉性，如重视人情往来、习惯口头约定等，这些文化习惯在城市环境中可能不被充分认可。此外，随着年龄增长，部分随迁老人的生理机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视力、听力、记忆力、行动能力的衰退，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获取信息、学习新技能、参与社交活动的的能力，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会的内在制约条件。

6. 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协同治理路径

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需要制度层面的政策调整、社区层面的服务供给以及家庭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形成一套相互配合的治理思路。

6.1. 完善制度设计，打破户籍壁垒

制度层面的改革是破解随迁老人融入困境的根本之策。第一，应逐步推进户籍制度与基本公共服务的适度脱钩，探索以常住人口为口径配置公共资源的政策模式，使随迁老人能够依据实际居住年限和贡献程度，逐步享有与本地居民相近的公共服务待遇。第二，要完善社会保障跨区域衔接机制，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全国统筹进程，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流程，扩大异地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简化备案手续，破除社保异地衔接的制度障碍；同时，推动养老服务资源的跨区域共享，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17]，实现随迁老人养老服务需求与迁入地服务资源的精准对接。第三，强化针对性政策供给与顶层设计，将随迁老人纳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由民政、卫健、人社、文旅等部门协同制定专项融入政策，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同时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支持随迁老人的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社区融入等工作，平衡迁入地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鼓励人口输出地与输入地建立财政协作机制，共同承担随迁老人的服务管理成本。

6.2. 强化社区依托，提升服务可及性

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改善随迁老人融入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从多角度发挥社区作用，首要的就是开展精准摸排，将随迁老人纳入社区服务的常规对象，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摸清辖区内随迁老人的数量、结构与实际需求，为精准服务提供数据支撑。在服务载体方面，可在社区层面设立随迁老人专项服务站点或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医疗协助、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服务专员负责日常接待与资源链接。在公共空间方面，应优化社区活动场所的开放时间和使用规则，适当增加室内活动场所的比重，降低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的门槛。同时，鼓励和支持随迁老人自发组建兴趣小组^[6]、互助团体等内生性社会组织，社区可提供场地、经费、培训等支持，帮助其实现规范化运作。此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为有特殊困难的随迁老人提供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等专业化服务，弥补社区工作人员专业能力的不足。

6.3. 激活家庭与社会支持网络

通过社区家长课堂、家庭工作坊等形式，向随迁老人及其子女普及代际沟通的知识和技巧，帮助子女理解随迁老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帮助老人理解子女所面临的工作与生活压力，通过双向理解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和期待错位引发的家庭矛盾。同时，倡导建立平等互惠的家庭协作模式，子女应主动与老人商议生活和孙辈照料等方面的分工安排，尊重老人的意愿和身体状况。此外，随迁老人服务还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鼓励企业为员工随迁父母提供健康体检、城市适应培训等福利支持，通过政策扶持培育一批专注于随迁老人服务的社会组织，建立“社工 + 志愿者”的联动服务机制，由专业社工负责需求评估与个案管理，由志愿者承担日常探访与陪伴等常规性服务。

6.4. 关注个体需求，激发内生动力

随迁老人并非被动的服务接受者，通过适当的支持和培训，可以使其成为自身融入进程的积极行动

者。应针对随迁老人对城市规则相对陌生的问题,开展系统性的城市适应能力培训[18],内容可涵盖公共交通使用、医疗服务获取、智能手机操作等,培训形式可采用集中授课、一对一辅导、情景模拟等多种方式,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随迁老人群体中,往往存在一些热心、有能力、有影响力的骨干人物,社区工作者应有意识地发现和培育这批力量,通过赋权增能使其成为随迁老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核心人物。同时,搭建便于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和渠道,如组织随迁老人专题议事会等,使其声音能够被倾听、意见能够被采纳,从而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此外,应关注随迁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对存在轻度心理困扰者开展团体心理辅导等预防性干预,对存在中重度心理问题者及时转介至专业心理卫生机构。

7. 结语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折射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家庭变迁与社会福利转型的深层矛盾。在城乡结构加速融合、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时代背景下,随迁老人的“半融入”状态也体现出社会治理体系与流动社会现实不相适配的矛盾。因此,推动随迁老人实现全面、可持续的社会融入,要以制度重构打破户籍与公共服务的刚性壁垒,以社区治理创新搭建包容共享的支持网络,以人文关怀尊重老年群体的主体价值与情感归属。这是完善老年福利体系、推进健康老龄化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对构建和谐包容的老龄友好型社会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6-02-28.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2026-03-12.
- [2] 陈盛淦. 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6(3): 59-62.
- [3] 郑明俊. 农村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基于叙事分析的视角[J]. 农村·农业·农民, 2024(7): 37-39.
- [4] 麦尔哈巴·吐尔干江, 王洁茹, 孔凡磊. 随迁老人社会融合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孤独感的中介效应[J]. 现代预防医学, 2023, 50(7): 1251-1255.
- [5] 丁百仁, 王毅杰. 压力、资源与流动老人幸福感[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6): 33-43.
- [6] 张新文, 杜春林, 赵婕. 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J]. 青海社会科学, 2014(6): 88-95.
- [7] 梁丽霞, 黄燕. “漂”在异乡: 女性随迁老人由乡入城的空间实践与角色困境[J]. 妇女研究论丛, 2025(2): 76-90.
- [8] 李静雅. “老漂族”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2015.
- [9] 翟振武, 冯阳. 当今随迁老人家庭融入中的矛盾冲突及应对[J]. 中州学刊, 2023(2): 91-96.
- [10] 杨成凤, 尹仟仟, 阳港, 等. 日常活动行为视角下“老漂族”城市融入水平评价及影响机制——以合肥市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26, 35(1): 170-184.
- [11] 王康康, 李旻. 社区活动对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影响效应与机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3): 78-88.
- [12] 李艳, 齐亚. 区域文化差异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入的影响[J]. 学术交流, 2021(8): 132-142, 192.
- [13] 胡雅萍, 刘越, 王承宽. 流动老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8(6): 77-88.
- [14] 熊慧, 郭倩. 隐形的数字鸿沟: 物质接入对流动老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5(1): 200-212.
- [15] 蒲婷婷. 社交媒介使用对农村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25.
- [16] 王诗亮, 王志中.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长春市 A 社区为例[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3): 29-33.
- [17] 靳小怡, 刘妍珺. 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2): 90-100.
- [18] 段良霞, 景晓芬. 西安市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8, 38(6): 1487-1490.